

· 当代作家自选丛书 ·



黄宗英报告文学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

DANGDAI ZUOJIA ZI XUAN CONG SHU

当代作家自选丛书

黄宗英报告文学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责任编辑 徐 靖
封面设计 戴 卫
封面题字 何应辉
插 图 王为政

黄宗英报告文学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25 插页8 字数176千
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100册

书号: 10118·978

定价: 2.10 元

DE 82/13

出版说明

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自六十年代初从文以来，写了大量的散文、报告文学，以她独特的创作风格跃上文坛。收在本集的作品，大都是她的报告文学名篇。

她的报告文学特点，是以生活为基础，从人物的性格出发，部署结构，剪裁素材，安排细节。通过对描写对象的熟悉过程，去探索 and 发现他们蕴藏在内心深处的丰富感情和精神世界，并从中挖出耐人寻味的深刻寓意。读来亲切感人。

谈 心（代序）

将“五四”以来的报告文学编辑成丛书的倡议，是武汉师范学院师生提出的，得到了湖北省宣传部门党组织的赞助。现在，在省出版局的主持下，第一次编辑委员会胜利召开。编辑这部丛书，发起在屈原、李时珍的故乡——湖北，硬是要得！

我们的条件，和屈原、李时珍不能比，可是我们也会碰到屈原、李时珍难以意料的困难，任何时代，想扎扎实实做成一件事，都不是唾手可得。

主人向我转达了同志们的要求，要我谈一谈我是怎样写报告文学的？是怎样成为作家的？到武汉后，在招待所碰到一位七十二岁的考古学家，问我：“从前有个演员黄宗英哪里去了？”答：“就是我。”老专家眯起眼睛考察我：“哦……你怎么搞起创作来了？”哈哈，这实在难以回答，比让我立马当时再交篇报告文学还难，但既然来了，试着答一答。希望别烤糊了，这里是全国著名的“火炉”，蕴育着奔四化的热能，也洋溢着友情的高温，谈谈心吧。

我不是想当作家而成为作家的。作家——经常写作的人，只能有感而写。

我体会：作家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生活的激流中，经受着火与冰的淬炼，和人民一起，切身感受到社会的暖与冷、欢乐与痛苦、幸福与苦难、光明与黑暗、美与丑……，才可能换来色浓墨饱的一支笔。

我们的作家，无论是战士出身，工人、农民出身，知识分子出身，学生出身……，无论年纪轻或老，他们的作品能够打动人心，大都是在他所生活的那个领域里，有了大量的切身的感觉材料，作用于他的思维器官，驾驭着他的笔，凭借一定的技巧（表达能力），才写出作品来。

我很同意别林斯基的这句话：“诗人是社会、时代和人类感官的代表。他的痛苦和欢乐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命运，祖国的、社会的命运把这个作家卷进去了，升沉回转，有切肤之痛，有由衷之喜，动心而成文。心不动，一支笔在作家之手，也只是塑料笔杆、铍金笔尖而已。动了心，不管写的对或错，是活的作品；是时代的镜子。历史将考验它是平透的明镜还是折光的凹凸镜。而随风刮出来的作品，只是伪作品，将飘浮而逝。

所以，作家，作品，都只能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从主观要求出发。

所以，我认为八十年代，必是祖国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的年代。不管前进的道路上还有怎样的艰难和曲折，文学和艺术不可阻挡地要繁荣起来。优秀的作品必将成批地写下来。这不由目前的出版力量、印刷条件、纸张储量和种种困难所障碍得了的。因为我们的人民（包括已成为作家的作家和将要成为作家的作家），三十年来，是经受了超负荷的巨大欢乐、血泪痛苦、对祖国前途的担忧，以及濒于绝境中的最坚定的信念和期望，进行过前人所未曾进行过的战斗，思索着前人所未曾思索过的难题。总之，时代迫使我们心中凝聚着最深沉的爱与恨，这就是产生优秀作品和作家的沃土。

二

听说，在座的大专院校中文系师生，有的正研究我的作品，把我写过的（有的自己早忘了的）作品，全部都找来进行分析，评论作家的风格、特色、素质……。我象接受医生们的全身检查，不知道自己的血糖、血压、心电图……，将得出什么符号。谨表示愿意配合“体检”，找一找贯穿或重复出现在自己作品中的主旋律及其形成的过程。

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出生在一个工程师的家庭，当我在青岛读初小时，我们小同学和对面学校操场的日本小学生打架，互相扔土块，使全校师生受罚。当时青岛近海——我国的领海上，停泊着七十余艘日本军舰。在日本侵略军的威胁下，我们的鬓发微霜的女校长含泪鸣钟集合，在操场上，全校师生吞恨

低头肃立。我怎能忘记手工课时学绣花，那位长得十分娟秀的女老师轻轻地说：“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一枚小小的绣花针，也是德国礼和洋行进口的。”我怎能忘记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里，我报考了天津南开中学，发榜那天，我从租界往“中国地”走，半路上，行人纷纷避向街沿和店里，侵略军的坦克坦然地碾过祖国的胸膛。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考取南开中学，只知道敌机的炸弹、难民、水灾、浮尸……。当我交不起学费了，才到上海，干起当时被人看不起的演员这一行，我记得京沪路上，大雪封道时，躺在雪地里被鞭打的同胞；记得水龙头浇向抢着登车的百姓；我也忘不了灯红酒绿的繁华中女演员的恐惧，忘不了当年发生在武汉景明大楼的惨案所激起的全国人民的愤怒……。在深深的亡国之恨、茫茫的徬徨之苦中，党向我伸出了手，我找到了党，和我的人民一起，以激越的心情，进入新社会，和祖国共着命运，倾听着党的脉搏。

解放后，我这个正规学历只不过高中一年肄业的知识分子，成了演员剧团的“秀才”。我和演员伙伴们，一起经历了多少个有生以来第一次街头演出，第一次去部队、去工厂，第一次出国访问，第一次下乡落户……。我从演员多采的生活出发，配合演出需要，以惊喜和欢快的心情，随手写下多少个幕前致词、报幕连接词、小朗诵剧、诗、生活散记……。随写随丢，没想到当作家。只是因为通过演员的丰富的生活面，我看到了生机勃勃的祖国，看到了人民的美好心灵和愿望，看到我们的党是真心实意要领导人民走向幸福的明天的。看到这一切得来不易，前进更难，更难！我的写作生涯始于此，这是我提笔的定音符，回荡于胸际的主旋律，任凭噪声嘈杂，迫使几经

变调；任凭弦断琴碎，不忍重调旧曲；任凭蝉寒齿冷，启口难以为声；任凭花媚月娇，一片歌舞升平；我心中的主旋律总是将隐又显，将息复起，将抑犹扬……

三

从一九五八年上山下乡，我的演员生活渐渐“淡出”，作家生活渐渐“淡入”。

最近，某报记者曾打算发一条消息，热情地表扬我，说我所以写出《大雁情》等受群众欢迎的作品，是我一九五八年以来，长期坚持深入生活，进行思想改造的成果。我希望他不要这么说。不仅因为过誉难当，更因为不准确。我不同意笼统地提“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的口号，不同意不看时代的矛盾焦点在哪里、不顾时代的湍流在哪里，也不考虑作家的不同情况，一个劲地把作家往下赶。

作家，应该在生活的深水里，在激流中。

民主革命时期，我从学生走向社会，成为艺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从演员走向农村，都是从浅水走向深水。使我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屈辱和人民追求光明的渴望，深有所感。使我们对这个以小农业经济为主的祖国，在如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有所理解；对人民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才智能力的源泉有所认识。是的，这是深水。

然而，打个比方，一九六二年，我经常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农村喝稀粥，但这种“水”，对我并不比去“广州会议”发个

言更“深”。喝了稀粥我可以回家用“高知补助”补一补，而由于“广州会议”发言在运动中惨遭迫害的同志，他涉的水难道不深吗？是的，我从演员改行专业创作，迨自大跃进年代。我和伙伴们争先报名下乡。我第一天来到山乡，不辨稻粒和麦粒之区分。但我也如醉如痴地投入大跃进热潮，三天修条路，七天开条河，两个月搬座山。春寒霜夜里和乡亲一起护秧，台风咆哮中和乡亲并肩抢收早谷；秋色宜人时，又和乡亲们一起把已经灌浆的晚稻拔出来，往一块田里拚命地挤了又挤……。这一切我都斗志昂扬地干了，对的和错的都意气风发地卖力干。这一时期，我写了大量的歌颂大跃进的作品。我不知道对这一历史时期，还将有什么新的论断；我现在说的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

目前，四面八方都在考我，考我是怎么写出《大雁情》的？一共采访了多少时间？我不知怎么回答。我觉得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的因果，是很难说得明白的。我想说，一九五八年我不下乡，一九七八年就写不出《大雁情》。但假如我说，一九五八年下乡我怎么怎么有所改造，也难出口。一九五八年，我春寒料峭时下乡，盛夏溽暑就写成纪录性艺术影片（电影报告文学）剧本《你追我赶》（王丹凤主演），写两个生产队打擂台比高指标，比到后来，打印稿上的指标空着，我一再改稿把指标往上加码，指标加到多高才算合适，我也没数了。当然，这时期，文艺中反映“浮夸风”的作品，都被周总理说句“我有责任”一揽子包了。但是，作为有独立人格也应该有独立思考的作家，内心的触动，谁又包得了呢？端起贫下中农家的薄粥，嚼着葛根和小球藻的代食品时，该怎么想呢？

作家往往是和他的人民一起付出代价的，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生活、向历史交出我们的青春、精力、欢喜、痛苦、眼泪和希望。（当然，作家和人民中都有看得远、站得高的。我是一般的高。）

是的。我自己不下乡，难以体会五十年代广大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如饥似渴满怀豪情地奔赴穷乡僻野海岛边疆。我也记得，“四人帮”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全面专政”时期，在当时一片所谓“落实政策”声中，我被变相地“押”下去“改造”时，贫下中农怎样以火热的感情接待了我。我曾十分焦急，粉碎“四人帮”后一年两年过去，为什么文艺界的死了的、活着的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竟依旧阻力重重，我也相当困惑，当我走访许多科学研究机构时，那里选一位代表、一个先进分子，竟比搞科研工作本身要难上百倍，我遇到多少知识分子，“砸”后余生，壮志犹砺，全不顾累累伤痕，依然执著地走向理想、未来……。如果我没有上述那些感受，那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就是有人把《大雁情》中女主人公秦官属的事情用扩音喇叭对着我耳朵说，就是我和秦官属同志住在一个房间里，我也不会想到写她。她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作为，经历也并不离奇曲折。只因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理想，使我和我的描写对象有了缘份，或说：作家具备在这方面灵敏度较强的元素吧。

作家，从自己切身感受出发，走向自己熟悉的或陌生的生活领域，从水泉里舀一勺新鲜的水……。踏遍大江南北，结缘四宇八方，我不过想给人民舀一勺清凉的活水。

四

奇怪的是，我的被大多数读者所肯定的报告文学或散文，大都不是我计划要写的。

六十年代我写《特别的姑娘》侯隽，只不过想支持一下这个有志气的姑娘，我才和小伙伴搬进了她的小土屋。她下乡一年多，说不上有什么“丰功伟绩”，我们只不过为她坚韧的毅力、自找苦吃的精神所感动，想和她做几天伴而已，没想到做出一篇文章。

一九七八年，我作为《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特邀记者来到全国科学大会，也是事先约好不一定写稿的。我最怕被组织到一个会议、一次参观、一项观摩后要“立等可取”地交卷。万一我没有感受呢？有时，在“交卷”的精神负担下，本来该有感受的感受器官都错乱失灵了。《人民文学》编辑部同志深知文学创作规律，只说为我们争取到一个极好的接触科学界的机会。我和特邀记者小组的魏钢镤、秦牧、柯岩等同志，在已经先一步闯进科学界的徐迟同志热心帮助下，结伴雁儿般飞在五万名科学代表之中。我第一次正式采访秦官属，是和柯岩、王南宁等一起。向代表学习，也尽我们的可能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有所促进。我们当时只不过想把她的情况，向有关方面反映反映。

我们是作家、编辑、记者，更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公民。

在“雁群”的相互砥砺帮助下，当我决心着手写秦官属时，我深深感到三寸笔杆重千钧。

有人说，你到生活中去，可以先写些报告文学，积累多了再写小说。言下之意，写报告文学比写小说容易。我不以为然。各有其难度。涉及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一褒一贬分寸之间，不是闹着玩的。

一九六三年《特别的姑娘》发表，到了一九七四年我重返天津宝坻县时，得知我写的“小机灵”——离开侯隽嫁到邻县的女伴，听说我来了暗暗流泪，说：“人家都有个落实政策的盼头，我这个‘落后青年’的帽谁给我摘啊！”生活是复杂的。“小机灵”眼尖嘴快好给人家提个意见，人家就老拿我的文章“制”她了。听说此情，我赶忙骑着车、推着车、扛着车奔了几十里，去向“小机灵”道歉，并再再向干部、乡亲、邻里表明心迹，我并没有认为她是个“落后青年”，也许写时笔尖偏了一点儿……。

是的，写真人真事，必须对党对人民负责，对被描写的对象负责。

《大雁情》发表又被推荐后，反应较强烈，普遍认为道出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但也有个别同志几次提出抗议，我提笔写《大雁情》，是考虑又考虑，不然，一篇文章我不会从春天写到秋天，我的原意只不过要谴责那造成同志对立的根源，并无栽害某个个人而没根据地把秦官属同志捧上天的心意，如果我错写了，我愿公开道歉。笔下有人，在我只是一篇文章，在别人和秦官属，都是涉及人权的大事，报告文学作者应该十分珍惜党和人民给予我们的信任和权利，万不可哗众取宠，草

率行事。这不等于该批评的不敢批评，该表扬的不敢表扬。

我想，作为报告文学作者，我只不过是一名调机工人，只希望机器运转良好，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确实感到我们这个国家就象一部差点被“四人帮”搞得快报废的机器又渐渐在运转了。我作为一名从事文艺工作的公民，在我的眼睛所能看到的部位，感到需要加油的地方加几滴油，有障碍的地方拨弄拨弄，可能加速的时候，推进一挡，如此而已。当然，在我看到机器运转良好时，我也会欢快地唱起歌来。

童年时我读过一个故事：一个小矿工跟着爸爸下到矿井里，矿井塌了，小矿工在矿井口不断向被封在矿下的工友喊着：“我听到了，脚步声！我听到了，有人在铲土了！我听到了，近了！近了！……”我忘记这故事的结局如何，只记得工友们因为小矿工的呼喊持续着生之希望。我常常会想起这个小矿工，虽然譬喻总是蹩脚的。我们并不是在没有出口的地底下，祖国的航船已走出淤泥浅滩，重又启航了。生活本身孕育着积极的希望。

我行文的音色是抒情女中音吧。这是作者的生活所决定的。但历尽沧桑，与五十年代时比，我的音色、音量、音域都有所变化。我实在没想到建国二十八年后，我会哭肿了眼睛去写《星》，用我的笔去悼念屈死的亡友上官云珠。写这篇文章，是在全国电影界揭批“四人帮”大会期间，我听说平反昭雪的名单里没有上官云珠的名字。我越想越伤心、生气。她该死吗？！难道来自旧社会的演员，无论经过怎样的努力，做出怎样的贡献，被残害致死也不得清白吗？我立即提笔边擦泪边写，一口气，一天一夜写成。我和上官云珠同一年走向舞台。

我写的是亲眼所见，切身所感，几十年酸甜苦辣冷暖、扎心撕肺的痛苦，将泯而复燃的期望一起涌来。我写的上官云珠，我想到多少无辜死去的姐妹兄弟。我写的《星》，捧出了自己的和姐妹兄弟同志们的心。是的，一个成年人的心脏只不过半斤来重。如果抽出1CC——5CC血来，往往会查到各种不健康的成份。但是即使包含着不健康成份的绝大多数的心，毕竟是血红的跳动的心，汇入了祖国的心脏的血液循环，联系着党的生命。我衷希望今后再也不写、永远不会再写这种伤透了心、蘸着血和泪的文章。

然而，谁让我写这样的文章呢？我何尝想哭着、怒着写文章呢？我多么愿意歌颂，但既然人世间还存在着黑暗、暴行、欺骗和不平，作家的薄薄的纸上就不能不记下生活的投影。我的“音色”（个性吧）——决定了要选择明快的基调，有光明，我总是要歌颂的。但歌颂和暴露是在一个统一体内，在歌颂的同时必然也鞭挞着矛盾的另一方面。生活是复杂的。艺术表现也是复杂的。我唱我的“女中音”，也不奇怪有铜锤花脸，有东方朔，既然生活中还有必须大吼呵斥、嘻笑怒骂的对象存在。

五

九九归一我只说了一个观点。作家好比一部电子计算机，能算出什么结果来，要看存进了怎样的信息，其敏捷度、难度（反映的深度和广度），不仅在于生活给他什么题目，也在于

他长期储存了多少“地址”。

年轻的同志希望我具体地讲几条写报告文学应该注意的问题。我的脑子是流动的浑沌体，理不出个条条道道。试试看：

1、切忌训人。要平等对待读者，相见以诚，以心换心。

2、让人物在稿纸上站起来。要十分熟悉自己描写的人和环境，我一般很少单靠采访来写。往往深入生活时间很长，也很笨，落笔则相当快。当我睁眼闭眼人物在我心里都是活的时候，就让形象把我的笔带着写了下来。

3、灵魂的解剖者，要敢于解剖自己的灵魂。

近年来，使我震动最大的是张志新的形象。我从张志新敢于以身捍卫真理的崇高灵魂里，照见自己灵魂的卑微。

难道我知道的、见到的、听到的比张志新同志少吗？为什么我不觉悟呢？

张志新是和我生存在一个客观条件下，只是在我接触到值得深思的问题时，我就不敢再想下去。不只因为长期以来我有个“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想”的习惯，更因为少想、不想，只不过是自己处境好一点坏一点的问题；想，深想，刨根问底地想，可能就是生与死的问题了。我怕！

忏悔留于停滞，认识才能前进。我痛切地认识到只有不涂抹、不掩饰自己的脚步，才敢于正视历史的脚步。如果我的新作比过去略增加一点战斗性，只是因为不平凡的时代、久经考验的党、多少坚持真理、以身捍卫真理的优秀共产党员和普通人民的榜样，震撼了我的灵魂。

4、永远不要自满。

我不是指一般地觉得自己哪篇文章写得还不错。文章总是

自己觉得还不错才拿出去发表嘛。我是指不要觉得我这个作家有什么了不起。以为自己一篇文章能起多么多么大的作用，甚至左右个什么形势似的。果真如此，中国只要多培养些作家就行啦。

我举个例子。粉碎“四人帮”后，我写过一篇怀念周总理的短文《天上人间》。自己写时很动情，许多人看了也落泪。这次我选集子时再读，觉得很单薄。我回想：当时文艺园地刚刚能够出现周总理的形象，那个时候，只要出来个报幕姑娘，闪着亮晶晶的泪花说：“下一个节目，深情悼念周总理。”诗还没朗诵，歌还没张口，观众的眼睛也许已经湿了。一部作品，只要一问世，你的读者已经和你一起在进行再创作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以他们的切身经历和感受丰富补充着你的作品。

我们应该永远全神贯注地、热情地、谨慎地注视你所服务的肌体——人民、祖国、党。

我们要反映伟大的时代。这个伟大是包括着我们党要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重重矛盾和困难。我们要反映得准确、有力量，只能和人民一起在实践中去求得。

一九八〇年二月写于武汉